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1.00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思想情境与理论建构

米华,张新笛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日益紧迫的中国近代文化危机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文化纷争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文化背景。为此,毛泽东建构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之“三位一体”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具有反帝反封建、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情境。同时还完成了准确定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基本纲领的理论建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不仅破解了中国近代文化危机,也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永续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思想情境;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009-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重大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奠基人和伟大旗手,毛泽东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近代以来因文化危机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纷争进行了彻底整合,建构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因而,深入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思想情境和理论建构,对于新时代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中国近代文化背景

毛泽东之所以要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除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外,自有其特殊的中国近代文化背景,即日益紧迫的中国近代文化危机以及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文化纷争。

文化危机是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后才出现的社会历史问题,也正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局。因为,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家国同构的宗法制社会政治结构维系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中国古代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也从未遭遇过文化危机的困扰。然而,随着近代海陆交通的发展,原有的地理屏障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西学日益东渐。中国几千年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在鸦片战争前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产品进行了最为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实力悬殊,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被不平等条约

收稿日期:2022-08-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KS145);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JD27)

作者简介:米华(1966—),男,土家族,湖南溆浦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裹挟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外国资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文化依赖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宗法制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遭到威胁。从此,历久弥坚的中国文化再也抵挡不住西方文化的攻击。正如马克思所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文化危机。

面对危机与挑战,中华民族从来不缺振臂一呼者。鸦片战争后,意识到文化危机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率先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魏源深切感受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中西文化融合主张,成为鸦片战争后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人。在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秉承魏源“师夷长技”的中西文化融合理念,将“中体西用”当作中国文化发展的不二选择。1861年,冯桂芬最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西文化融合主张^②,是“中体西用”文化选择的发端。此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对冯桂芬的文化主张进行多层次阐发而使其更加明朗。1895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将洋务派的文化主张最终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③“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无疑有助于西学的传播,给当时僵化的封闭的封建文化注入了西方文化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但“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总是深陷于维护君主专制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矛盾之中,从而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当洋务运动发展到“求富”阶段,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应运而生,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为应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新一轮的多元文化选择。最早由地主阶级衍生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相当强的保守传统特性,以至于他们的文化选择呈现出比较明显的

保守主义色彩。即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重建中国新文化,表现出保守儒家传统的文化倾向。由于不能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保守主义文化很难服从、服务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现实需要,与中国文化前进的正确方向相背离,偏颇、失当乃至错误就不可避免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则倾心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进行了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它是对保守主义文化选择的一种否定,彰显其与中国传统的离异。他们在全面肯定近世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主张以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为主体重建整体性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但因他们完全脱离本土文化实际,加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上的软弱、妥协和经济上的依附于西方列强,而始终不能为自由主义的文化选择提供合适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壤,使自由主义文化选择在20世纪上半叶昙花一现。新文化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派激进主义者,他们开始了激进主义的文化选择。即主张在摧毁中国封建文化和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种种丑恶的基础上,以当时流传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为内容重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新文化。激进主义文化选择是以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具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合理因素。但他们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注定其必然被科学社会主义所取代。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巩固其独裁统治,并扩大其经济垄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兜售他们的文化主张。即以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文化主张。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所创建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是一种“纯正的三民主义”,即以儒家“道统说”为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其目的仅仅是复兴中国文化,而非革命的三民主义,更非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然后,他们又在“道统说”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中注入法西斯主义“力行哲学”、独裁思想,以此来宣示其法西斯主义文化主张。与此同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还运用国家机器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文化主张转化为国家的专制文化政策和奴化文化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即,将儒家的“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爱”理念、“道统说”的“纯正的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杂糅在一起,以“诚”为核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为经,以“礼、义、廉、耻”之“四维”为纬,编织出了一个庞大的精神文化网络,以此来禁锢人们的思想。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尊孔读经逆流,提倡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企图从思想上阻止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文化实践方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还通过法西斯主义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大肆屠杀进步文化人士,企图从行动上扼杀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

面对近代中国文化危机及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各种文化鼓噪,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已成为当时中国不得不回答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决定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到底由谁来主导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来说,这一历史重任就不得不落在中国崭新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的肩上。因为,在“五四”以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意欲“扶将倾之大厦”的地主阶级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丧失了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能力,“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①。至于资产阶级,“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②。为此,作为“盟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通过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来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解决中国文化危机。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③。并由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道路的艰辛探索。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人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建构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④。在这一崭新的文化模式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最终统一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体”之中,构成“三位一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从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结束了鸦片战争一百年以来文化纷争的乱局,中国文化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正确前进方向。

二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思想情境

毛泽东所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坚定决心^⑤,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坚强意志,个中还融入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抉择的思想情境。

第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具有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境。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仍然没有革除“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是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的”旧文化,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⑥。民族资产阶级的多元文化选择以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纯正的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文化选择,在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⑦。由此可见,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地主阶级的文化选择,具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有明显的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色彩。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虽然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其妥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都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文化主张。因而,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都丝毫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因素。

而在毛泽东建构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中,“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①。而且,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通过创办党报党刊、组织革命文化队伍、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新书等方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反对封建主义专制文化和帝国主义奴化文化,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造就了一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②。“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③因此,无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还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看,毛泽东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都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情境。

从此,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情境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基调,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鲜明特色和永不改变的主旋律。中国新文化再也没有封建文化浓郁的“道统”色彩,再无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奴颜与媚骨。

第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充满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科学审视的思想情境。在毛泽东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中,就十分

注重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原料。就中国古代文化而言,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中国古代文化一概等同于封建文化。而且,“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⑤。就外国文化而言,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⑥在毛泽东看来,外国进步文化应当包括外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我们不仅要吸收外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要吸收外国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等。总之,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虽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⑦,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为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糟粕与精华必然并存。外国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既有与中国本土文化不兼容的成分,更有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资产阶级文化内容。因而,无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不能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⑧对待外国文化也一样,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选择、改造,而不能生吞活剥、机械照搬,更不能搞“全盘西化”。他说:“但是一切外国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中,充满了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思想情境,即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因此,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的民主性和革命性,是毛泽东科学审视古今中外文化思想情境的核心要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中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的思想情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准则。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坚决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②不仅如此,毛泽东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外国文化的思想情境,在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习近平将毛泽东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情境发展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说:“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③习近平还将毛泽东科学审视外国文化的思想情境,发展为世界各国文明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他说:“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前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④而且,习近平还认为,在坚持世界各国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应该恪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基本原则。他说:“各

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⑤

第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情境。一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⑥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人曾经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了彻底肃清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⑦即“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⑧。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首先是要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合,即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仅仅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中国历史特点和中华民族形式。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总结和继承中国文化的珍贵品,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其实就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因此，毫无中国历史特点和民族文化形式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主要是指要尊重自己的历史，尤其要尊重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③另外，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称的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精华的“珍贵品”相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明确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使他所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情境，并成为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渊源。

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理论建构

毛泽东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不仅终

结了鸦片战争以来因文化危机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纷争，还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科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情境，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建构。

第一，准确定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古代，华夏先民就十分重视“以文化人”。《周易》中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化史上，华夏民族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至上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均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征服者最终变成被征服者，造成了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假象。二是利益的驱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建立起“道统”文化体系和“卫道”文化系统，培育了庞大的卫道者群体。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卫道者拥有族权、父权、夫权。在他们看来，捍卫纲常名教既能抵御外族侵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又能为他们带来诸多实际利益，如物质上能够得到族人、子女、妻子等人群的厚待，精神上也能够得到族人、子女、妻子等人群的尊重，等等。卫道者们乐此不疲，造就了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甚至到了193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之际，“文化至上论”者却呼吁要谈民族自救必须谈民族文化的复兴，错误地认为早年洋务派的自强运动、维新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政治革命，虽然都是在进行民族自救，但由于没有从文化复兴入手，所以皆未能成功，正“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于向世界未来文化之开辟以趋，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④。这种试图以文化复兴来抵御日寇侵略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因而，“文化至上论”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危害极大，既麻痹了国人救亡图存意识的觉醒，还会阻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针对这种错误观念，毛泽东不失时机地给予匡正。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厘清了观念形态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把文化问题置于审视中国社会的视野之内，置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范围之内。一方面，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决定于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6页。

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并为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在他看来,中国的新文化决定于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又必须为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服务,即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另一方面,毛泽东又高度重视文化对社会改造的巨大能动作用。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他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③

第二,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道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开创了一条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特色的文化建设道路,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道路,毛泽东还赋予其全新的内涵。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④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赖以开展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了灵魂。二是以“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式,层层递进,不断反复,螺旋式上升,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雪中送炭’”^⑤。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普遍的启蒙运动”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启蒙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启蒙。当然仅有新文化普及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新文化的提高工作,“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⑥。同样,这种提高也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指导实践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普及与提高”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三是“完全融合”的目标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并无分隔,成为被广大民众所掌握的整体性文化,并化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具有恰如其分的民族文化形式,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注入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灵魂。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光辉典范。

第三,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准确定位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开创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后,又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即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纲领。

“民族的”纲领内容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性指向,是“以我为主”的内容诉求。毛泽东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⑦这一“民族的”内容诉求,一方面,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压迫和文化侵略,自觉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不能有任何的奴颜和媚骨。另一方面,又要求这种新文化应当具有本民族的特点,不能脱离中国文化的实际,不能割断中国文化的历史,必须保持本土文化的主色调、主旋律。

“科学的”纲领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性指向,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所要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实现的文化价值,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①。由此可见,“科学的”价值性指向就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实现这些“反对”内容和“主张”内容的完美统一。仅有“反对”而没有“主张”,是不能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所在的。同样,仅有“主张”而无“反对”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当然,除了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外,毛泽东认为还必须反对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他说:“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

“大众的”纲领内容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性指向。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这就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反映工农劳苦大众的工作和生活风貌,并为他们服务,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最终达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目的,达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目的。另一方面,“大

众的”其目的性指向又要求“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广泛参与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之中,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真正主人,始终体现工农劳苦大众的意志,因而也是民主的目的性指向。即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达到彻底的民主主义的目的,即达到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相统一的目的。

毛泽东在准确定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后,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又规定了汲取中西文化中民主性、革命性精华的根本标准,从而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的理论建构。

毛泽东所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灵魂的,因而,它能够适应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建设。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模式下,我们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功,而且还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模式永远是照亮中国先进文化前进道路的灯塔。

On the Spirit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s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MI Hua & ZHANG Xin-d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Mao Zedong's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is based on the rising cultur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Thus, Mao Zedong builds up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where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are rolled into one. Mao's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highlight hi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spirit. Moreover, it surveys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fine culture. It examines accurately how culture plays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invention of new democracy,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new democracy. Mao's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not only handle the cultural crisis in modern China, but also serve a guide for the advanced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 Mao Zedong; new democratic cultural modes; spiri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唐尧)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